

陳 澧 著

東塾讀書記（外一種）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鈞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

主編 錢鍾書 執行主編 朱維鈺·楊志剛 編校

東塾讀書記
(外一種)

陳澧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塾讀書記(外一種)/(清)陳澧著. - 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 1998.6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錢鍾書主編)

ISBN 7-108-01148-4

I. 東… II. 陳… III. 陳澧-文集 IV. Z42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98) 第 16018 號

東塾讀書記(外一種)		著者 陳澧		責任編輯 潘振平		封扉設計 寧成春		版式設計 陸智昌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二十二號)		郵編 一〇〇〇一〇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	
版次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開本 六三五×九六〇毫米十六開		印數 三千冊		字數 二十八萬九千字 印張 二十七·一二五	
定價 三十八元									

陳澧是晚清嶺南學術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頗豐，在學界久負盛名。《東塾讀書記》為其晚年作品，雖未完成，亦能代表他的學術見解，反映他的思想矛盾。為使讀者了解陳澧的一般政見和《東塾讀書記》的寫作意向，又從《東塾集》和《東塾續集》中輯錄十篇書信序議，取名《東塾文錄》，一併收入本書。

漢學師承記（外二種）	江 藩	方東樹著
書目答問二種		張之洞著
弢園文新編		王 韜著
郭嵩燾等使西記六種	郭嵩燾 薛福成	劉錫鴻 著 宋育仁
東塾讀書記（外一種）		陳 澧著
萬國公報文選		
新學偽經考		康有為著
尨書 初刻本 重訂本		章炳麟著
康有為大同論二種		康有為著
劉師培辛亥前文選		劉師培著

編者說明

《中國近代學術名著》的晚清編，主要輯集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中國人文學者的代表性論著，以期展現中國學術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異過程。

遴選的學者和論著，着眼於學說有新意，有己見，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領域，發生過深遠的歷史影響。

結集則不拘一格，以專題為主，每種或收一人一書，或輯一人多篇，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題論著為一編。

編者對每種都做以下工作：選擇底本，取原校較精的刊本；異本互勘，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覆核引文，凡原著約引節引而與出典差異較大者均出校記；重施標點，包括分段；編製索引，分人名、書名兩類。

編者對每種都撰有導言，附於篇前。導言既重可讀性，以助讀者瞭解相關專題的歷史實相；也重學術性，當然屬於導言作者的一得之見。為行文簡明，諸導言凡引證出處、攷訂史實或商榷

疑義，均以附注形式陳述。

限於編校出版的條件，晚清編擬分輯刊行，初定每輯十種，先成先印。如可按設想出齊，當能略見系統性。

這套選編，設計始於一九八八年，由當時主持香港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創議。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目錄，均經主編錢鍾書先生審訂，交由執行主編朱維錚組織實施。

全編原定由兩岸三地同時出版，因而版式定為繁體字直排。第一輯早已編成發排，由於種種緣故，長期不克面世。現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香港三聯書店同時推出。

編者感謝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處參預編纂的年輕同仁、感謝三聯書店辛勤校勘的諸位編輯，同時期待高明指正。

編例

一、本叢書選輯十九世紀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學說名著，每種均由編者予以校勘整理：

底本。以原刊為主，有不同版本者擇善而從。

校勘。正底本排校舛誤，兼正原作者明顯筆誤，並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據正誤。一般不作理校。

除對校諸本擇善而從者外，凡校勘改動處均出校記，以頂注形式見於同頁。他校所得亦以校記出之，於正文不作改動。

節錄。於篇題下注明，並於篇末注明節錄出處。

標點。原刊本無標點或僅有舊式斷句者，概施以新式標點。

分段。文言文論著均重分段落，以便讀者。

注釋。作者原注概從原刊。編者增注限於指出原著有關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顯謬誤，以頂注出之。

譯名。中文譯名及譯文概從原刊。如原刊注有外文並有謬誤，則由編者逕予改正。為方便閱讀，若干種書末附有新舊譯名對照表。新譯名均依中國大陸出版物的通行譯名。

版式。概用繁體字，直排式。除涉及語言文字學說外，凡原刊古體字異體字，均改為通行繁體字。原作或有雙行夾注，現均改為單行夾注。

索引。所選諸種均增編人名、書名兩種索引，以便通檢。

二、本叢書所選諸種，專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參考價值者，予以保留，並移作附錄。每種前均冠以導言一篇。

一九九六年五月

導言

朱維鐸

壹

以粵海地區為重心的嶺南學術，在明代曾走向繁榮，出過王學的先驅陳獻章，出過同王守仁抗衡的湛若水。從利瑪竇於一五八〇年進入廣東，這裏又成為同近世西方文化接觸最早的地區。但十七世紀後期清帝國經過反覆征服終於控制整個嶺南以後，這裏的學術文化，非但没有隨着戰爭的過去而恢復元氣，相反似乎每下愈況。康熙末年，經學家惠士奇任廣東學政，甚至尋訪不到可充鄉土楷模的「能文」之士〔一〕。直到號稱學術繁榮的乾嘉時代末期，情形並無改變。

原因仍待研究，但主因顯然不在於缺乏財富。正好相反，由十六世紀初期起，廣州港便一直是明、清帝國同近世歐洲進行海上貿易的主要門戶，有時還是唯一門戶。歐洲殖民者從新大陸和東南亞掠奪的大量白銀，通過這個門戶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以換取越過五嶺運往廣州的中國茶葉、絲綢、瓷器和藥材。這使粵海地區在三個多世紀中，成為貧銀的中國的歷屆帝國政府，得以依賴「外匯」長期支持貨幣流通的銀本位制。這由中國貨幣史的研究早已獲得證實。不待說，廣東也在經濟上獲益。

問題是財富落入誰手？商業和運輸業的發展，固然為城鄉居民提供了就業機會，但帝國政府的通商壟斷，則使中外貿易主要變成內庫的財源，地方官吏、行商等特權者的利藪。因此不難理解，主持廣東軍民政務的總督、巡撫，在雍正、乾隆到嘉慶三朝，罕由非旗籍官員充當，而粵海關監督一職，在整個清代幾成八旗子弟的禁嚮。百年間這裏的督撫很少不享有貪墨名聲。偶有號稱能員的人物，關心的也只是對內強化地方治安，對外強化華洋隔離。（二）於是也不難理解，這個地區雖已「太平」百餘年，而「文治」依然落後如故。

嶺南學術重有起色，轉捩點應說是阮元督粵。阮元是揚州學派學者，但官運亨通，以翰林起家，屢任學政、巡撫、總督，五十三歲調兩廣總督，一任九年，其間六署巡撫。他的政見未必高明，但異常重視文化教育事業。他在廣州創辦學海堂，編刻《學海堂經解》（即《皇清經解》），重修《廣東通志》等，對於晚清的嶺南學術發展起了推動作用。他注意識拔本地人才，學海堂初期聘用的學長曾釗、林伯桐等，都是他訪知的地方學者。後以編校《粵雅堂叢書》等知名的譚瑩，也是他親自從童生中發現的學者。（三）而出資精刻這些學術巨帙的是著名行商伍崇曜，也可見阮元的提倡風雅如何款動富商把眼光投向文化事業。揚州學派原已出現經史諸子並重和兼容異說的取向，阮元又特別提倡消除門戶之見，而且注意西學入華史。這也給嶺南學人留下深刻印象。

嶺南學術稍成氣候，已在鴉片戰爭以後。有「會通」特色的代表人物，一是朱次琦，一是陳澧。他們都主張調和漢宋，都提倡「古之實學」，都以講學來傳播自己的見解，並都在一八二二年同受清帝的特旨表彰【四】。但朱次琦更傾向理學，把修身看作學生的第一要求，而且憎惡清代

漢學勝於憎惡明代王學，敵視「洋務」一如敵視「賊民」，留下的論著也少。【五】從學術史的角度考察，陳澧在晚清實屬使嶺南學術具有較大影響的首出人物，而陳澧的《東塾讀書記》尤引起注意。

貳

一八七一年即清同治十年，六十二歲的陳澧，寫過一篇《自述》，說是「生平無事可述，惟讀書數十年，著書百餘卷耳」【六】。這篇自傳，以後被幾種有關陳澧的傳記所取材【七】。不妨據此對他略作介紹。

陳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字蘭甫，廣東番禺（今廣州）人。他自幼習舉業，十七歲即獲得縣學生員資格。此後幾年頗為得意，先被學政翁心存賞識，以廩生入粵秀書院肄業；讀了三年便題了優貢，由三年任滿的學政與總督、巡撫聯名向朝廷保舉的本省優秀生員；次年（一八三二）又中道光壬辰科鄉試舉人。因此他於二十四歲人都參加會試，省城輿論看好，以為他此行大有中鼎甲而點翰林的希望。豈知出了省境就交了歹運，十三年間考了五次，無不名落孫山外。不得已向吏部報名參加六年一輪的舉人「大挑」，機會是十取其五，滿以為可選得縣令，不想又考在二等，只能做教官。他安慰自己，「以為不能治民，猶可以教士，天下治亂未有不由于士習而起者。」【八】可是等到一八四九年實授本省河源縣學訓導，到任便發現「亂」的不是士而是民，

「盜賊遍地」；僅兩個月就請病假回家。幸虧跑得早，不然就像河源縣令一樣，「爲賊捉去矣」【九】。不過他還想一試，因爲這一年道光帝死了，咸豐帝繼位，照例要在改元之初開恩科。於是他又北上會試，想不到又落第。舉人經六次會試不中，便可循年資補選知縣。他在一八五六年捱上了，但世道更亂了。太平軍還在長江中下游同清軍鏖戰。南海上空又戰雲密布，第二次鴉片戰爭將從廣州開釁。「若當此時而出，則宜有勘亂之才；且有其才，尤當有其權。」【一〇】誰都知道亂世的親民官難當。這時陳澧更擔憂被狡詐的上司驅策，陷人民人洋人衝突的夾縫中被擠扁。於是只好放棄追求了二十來年的「百里侯」，申請改授京官。於是被授國子監學錄【一一】，一個正八品的最冷小官職，相當於後來國立大學的系主任助理一類腳色。除帽頂由銀色改金色，公服由青綢改青緞，並在胸前背後加了兩塊繡有鶴鶉的補子，同舉人沒有更多區別。

還在一八四〇年，陳澧已受聘擔任學海堂學長，即後來的班主任。出仕無望後，他又在這裏執教十年。直到一八六七年出任新辦的菊坡精舍山長，即校長，直到七十三歲去世。他前後在廣州的這兩所舊式高等學府，任教共四十二年。教出的學生不少。在政壇上知名的，例如戊戌維新期間「帝黨」名角文廷式，是他的菊坡精舍弟子；清末立憲運動期間首唱「十年預備」方合國情而受輿論唾罵的于式枚，也是他在菊坡精舍的弟子。【一二】

學海堂和菊坡精舍，都是以阮元任浙江巡撫時創辦的杭州詒經精舍爲模式的。「以古學造士」【一三】，課程以經學爲主，兼及史學、諸子學。「小學」（音韻、文字學）是人門功夫，明地理、知曆算被看作解經研史的必要手段。教師講授以外，有師生問答，有命題和選題的習作即

「課藝文」，優秀習作連同教師的範文一起結集刊印。砥礪品格仍被視作首要的，但更多要求自覺用共同尺度約束行為，而不僅單靠外在的強制。因此，這樣的教育方式，更其是課程結構和教學內容，當然不是近代化的，而是「復古」。但相對於當時的官學私塾的教育來說，這種復古，正是對於講書「但爲作時文計」的惡劣風氣的否定和突破。晚清在不同側面不同程度超越中世紀後期統治學術傳統的著名學者，多由這類學府出身，不是偶然的。

所謂敗軍之將更善於學習，未必盡然，但對於陳澧來說，這倒是恰當的形容。他在會試場上六戰六敗，耗去了從青年到壯年的人生最好年華，兼以目睹耳聞，使他對科舉制度本身由懷疑到否定。「天下人才敗壞，大半由於舉業」【一四】；「文章之弊，至時文而極；時文之弊，至今日而極」【一五】。諸如此類抒發憤懣的言論，屢見於他的文字。

因此，當陳澧決定退出功名角逐，轉而從事於人才教育，那時他把目標定爲使後進不再重蹈覆轍，便不言而喻。但他在公開議論中，還不敢鼓吹取消舉業，只敢要求「廢時文」，甚至只敢要求先改變「割裂經書」的命題方式，因爲他害怕冒犯已靠想靠八股晉身的官僚士人的利益。「大凡變法者，漸則行，驟則不行。」【一六】——這不禁令人想到日後康有爲力陳變法「不可躡等」的靈感由來。

既然連變革科舉舊法也要「漸行」，那就可以理解，陳澧分明志在用世，「見時事之日非，感憤無聊」，分明不以在學校授課訓徒的有限效應而滿足，決定上追他最服膺的顧炎武，寫一部堪與《日知錄》比擬的鉅著，但他又表白此書與《日知錄》不同，既不想記博聞，也不敢談治法，

「但論學術而已」。理由其實在他的私信中也說了：「非無意於天下事也！以為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吾之書專明學術，幸而傳於世，庶幾讀書明理之人多，其出而從政者，必有濟於天下。此其效在數十年之後也。」^{〔二七〕}可見他的自負決不亞於顧炎武。因為這段自白，令人立即記起顧炎武對《日知錄》未來效應的自我預測，所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之隆」^{〔二八〕}。

本來，兩個世紀的清學史，已經證明顧炎武的預測錯了。他的政治主張，集中在論「治道」的中篇，但恰好這一部分，在後世受到最大冷遇，倒是他在上篇「經術」中所顯示的經史研究方法，卻受到十八世紀的漢學家們異乎尋常的崇拜。原因不盡在於學者們害怕多疑的清帝國統治者找到文字獄的打擊對象。原因還在於中世紀歷史早已昭示，沒有任何政府曾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正如黑格爾所說，「當重大事變紛乘交迫的時候」，「一個灰色的回憶不能抗衡『現在』的生動和自由。」^{〔二九〕}陳澧欲希蹤顧炎武，寫一部給未來從政者據以「變法」的教科書，卻避開關於政治弊病的直接批評，而用學術明則人才出、人才出則政治清的邏輯，來替自己既想出頭又怕受咎的心態辯護，正好表明他沒有從顧炎武的失敗中間學到什麼。

不過也需指出，陳澧寄希望的來者，不是顧炎武寄希望的「王者」。他屢次強調，未來的希望在下而不在上，在士而不在官。他一再宣稱，只要年青學人實現顧炎武所述過的孔子二語，「行己有恥，博學于文」^{〔三〇〕}，那麼新一代的政治領袖，必將勝於「俗士之居大官者」^{〔三一〕}。歷史證明這同樣是幻想，但把幻想改變現狀的力量，由個別帝王而移向「讀書明理」的羣體，在那

個時代便不能不說是較為高明的幻想。

表現陳澧這種矛盾見解的論學術著作，便是他沒有寫完的《東塾讀書記》。

叁

《東塾讀書記》，書名原擬為《學思錄》【二二】。不待說，原名取自《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二三】。它草創於一八五八年。可能由於這一書名的涵義，更適合於誨人而不足以自見，陳澧在一八七一年又將它改成《東塾讀書記》【二四】——取齋名為書名，由此人稱他為「東塾先生」。

陳澧原計劃寫二十五卷。按照目錄，一至十卷論儒家十二「經」；卷十一論「小學」，但含《爾雅》，因而這十一卷實際要論流俗所謂「十三經」的全部；卷十二論先秦兩漢諸子；十三至二十四卷論西漢到「國朝」的學術，內有兩卷專論鄭玄和朱熹的學說；卷二十五稱「通論」。以上結構，顯示《東塾讀書記》實分上下篇。上篇為「經學」，小學、諸子則是附論；下篇為「經學史」，而所謂通論似為結語。

一八七五年清朝改元「光緒」。也許又值「皇上初政」，再度喚起陳澧「或可以自効」的希望緣故【二五】，他在這一年刊佈了《東塾讀書記》的起首兩卷，即《孝經》卷和《論語》卷，就是明證。這不是我的推測。所謂十三經，序次照例先列「五經」，無論經古文學或經今文學都

如此，不同的只是「五經」內在次第「二六」。而以《孝經》居首，《論語》次之，則是陳澧的「發明」。卷一讀《孝經》記，凡十三則，卻有近一半篇幅，歷引鄭玄、許沖、司馬光諸語，稱《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合以《論語》，「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二七」此卷特引咸豐帝令各省歲科試增《孝經》論一事，讀曰「正合東漢之制」，而誰都知道四歲的新君是作爲咸豐繼子登極的。陳澧趕在光緒稱元這年推出這兩卷，不正是《東塾讀書記》寫作意向的直接發露麼？

那以後，《東塾讀書記》便不得不隨年寫定而分卷刊行。寫作形式一如《日知錄》，一條條的筆記串輯成卷，每卷多則數十條，少則十餘條。每條字數也不相等，有近似論文的長篇，有好像雜感的短論，有徵引頗廣的考證，也有片言隻語的摘錄。陳澧是顧炎武的「著書不如鈔書」論的信徒，認定「鈔書著書合而爲一」，方顯作者的學問博洽程度。「二八」他所謂的鈔書，自然指顧炎武所說的，好比良工開山採銅而鑄新錢，並非鼓吹「天下文章一大鈔」——那恰如顧炎武所譏「今人纂輯之書」，非但是買舊錢當廢銅以充鑄，而且是把屬於珍貴文物的古錢予以破壞。陳澧既然如此高自期許，因而《東塾讀書記》的篇幅不算大，但到他去世前的七年裏，僅刻成十五卷，共收筆記六百十一條「二九」，總計只有二十萬字左右。

陳澧生前沒有寫定的部分，佔原擬卷數的三分之二，而且都屬於前述的全書下篇，即由漢至清的經學史部分。可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系統的中國經學史研究，較諸經學的原典研究，在學術上更有必要。「三〇」陳澧在致友人信中曾一再說，他著此書，旨在「通論古今學術，不分漢